

中越關係嬗變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 (1971-1992)

• 馮一鳴

摘要：中老（中國、老撾）邊界問題的生成與解決，並非純係中老國家關係嬗變的產物，而是自始至終受到中越關係與中越陸地邊界對抗與緩和態勢的牽引左右。1970年代中期以降，中方賦予越蘇同盟以過於濃重的敵性色彩，從而將越南黨承襲自印度支那共產黨傳統的「印支聯邦」訴求視作嚴重威脅自身安全的「修正主義南方戰線」，因此竭力離間越老「特殊關係」，將老撾視作敵對國家，並在中越邊境衝突期間於中老邊境採取強硬措施。中方因受國際共運地區分工傳統等因素影響，一度將越老兩國等量處置，客觀上造成了中老邊界的不必要緊張，而憑藉對老撾黨獨立性的重新認識，加之中越關係的最終轉暖，中方於1990年代初主動提出解決中老邊界問題，此舉促成了中老邊界嗣後的長期和睦穩定。本文以1960年代以降中國對於印支革命與地區安全的總體考量特點為主線，從中越、中老兩組邊界問題的共生特性出發，分析中國處理對老關係和中老劃界的政策緣起，以及越南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關鍵詞：中老邊界 中越關係 越東戰爭 印支革命 越蘇同盟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陸地邊界總長約710公里。縱觀中國與其陸上鄰國的諸條邊界，中老邊界無論就其管控程度、穩定狀態、邊民流動以及治安情況而論，均堪稱難得的「模範邊界」。不僅如此，1990年代中老邊界的談判劃定過程亦屬相當順利，兩國政府對於邊界問題的解決結果均表滿意。就中老邊界問題的緣起而言，1885年法國迫使清政府訂立《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後，老撾於1893年10月淪為法國殖民地，這一歷史鉅變將中老邊界問題推上歷史舞台。自1893至1895年，中法雙方重點圍繞位於老撾北部與中國雲南交界處、本屬中國領土的猛烏、烏得兩地反覆交涉；清政府迫於

*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周邊國家對華關係檔案收集及歷史研究」（15@ZH009）階段性成果。

時局壓力，最終同意割讓上述兩地。1895年6月20日締結的《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對中老邊界作出相對明晰的分劃說明；中法兩國官員則於條約簽訂後迅速展開多輪勘界立碑活動，此舉在確認中老邊界諸段走向的同時，也為日後進一步解決邊境地區界務問題提供了實地信息基礎^①。

中老邊界自1991年兩國締結劃界條約以來，長期處於「保持穩定，時需鞏固」的較理想狀態，特別是與中越邊境「緩中存憂，時有糾紛」的情況及中緬邊境頻仍的跨境衝突與滲透活動相比，中老邊界在中國西南腹地面向印度支那半島的對外交往態勢中，堪稱難能可貴的無爭議安定域段^②。回溯中老邊界釐定的歷史過程，兩黨兩國的具體溝通協調頗為順暢，自始至終未出現明顯的利益糾葛與爭執熱點。然而，這並不意味着針對中老邊界問題的歷史考察流於平素扼要的泛論直敘。事實上，由於老撾人民革命黨（以下簡稱「老撾黨」），1950至1975年稱為「巴特寮」與越南共產黨（以下簡稱「越南黨」），1951至1976年稱為「越南勞動黨」長久以來的「特殊關係」，特別是自越南抗法（1946-1954）、抗美戰爭（1955-1975）以降形成的全方位同盟互動，中國無論處理與老撾的黨際雙邊關係，抑或單就中老邊界問題折衷協調，均離不開中越關係，特別是中國應對越南「印支聯邦」（越南黨將印支三國革命視為自己的傳統責任）歷史抱負的嬗變波折；中國共產黨自1950至1970年代因應越老「特殊關係」審度政策，客觀上直接決定了其處理對老關係的動機與實際效果。有鑒於此，欲釐清中國處理中老邊界問題的前奏與來龍去脈，就必須對中方之於越老同盟及「印支聯邦」戰略的互動關係作系統完備的歷史考察。

當前學界關於越南戰爭前後中老邊界問題的專論或旁涉研究寥寥無幾。關於社會主義陣營對老撾革命的應援態度，學界已有部分研究成果，學者利用美、英、法、蘇、越等國檔案材料，揭示了越老「特殊關係」的部分特質，提供了史實線索與文獻基礎。其中蓋杜克（Ilya V. Gaiduk）與奧斯倫（Mari Oslen）均立足蘇聯視角，大量運用俄國解密檔案，擇要梳理了老撾問題的緣起及1954年日內瓦會議解決印支三國獨立問題的主要經過。洪清源的編年體著作亦在一定程度上論及中國外交與中蘇關係變動對越南、老撾政策的影響。岡恩（Geoffrey C. Gunn）着力探究法屬印支殖民地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起源，並指出老撾黨通過在越南境內設立游擊基地，與越南黨前身的「越南獨立同盟會」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合作關係，從而贏得較之國內其他民族主義勢力的相對優勢。高沙（Christopher E. Goscha）則從意識形態、文化及安全戰略角度考察越老關係，認為越南在老撾的強勢姿態直接影響了越南黨的「革命觀」，通過對老撾內戰（1953-1975）的介入，越南黨愈加將自身視作東南亞革命的先鋒領導力量。阮蓮芳在其著作中以相當篇幅回顧了1945年以降的越南援老革命歷程，指出越南不斷加大對老軍事投入，中國在老撾的活動空間受到愈來愈大的擠壓。翟強則提出，由於內戰中老撾親美政權威脅中國南疆，中方選擇支持梭發那·富馬（Souvanna Phouma）的中立派政府，同時建議老撾黨保存實力，通過日內瓦會議達成暫時妥協，從而保證越南利用胡志明小道加強對南越武裝鬥爭^③。

不過，上述研究仍多以鋪敘梗概為主，視角較為單一，且均未交叉運用中越原始材料，因而未能詳及中越在援老革命過程中的具體審度。有鑒於

此，本文以中、越、柬、蘇等國檔案文獻為基礎，試圖以1960年代以降中國對於印支革命與地區安全的總體考量特點為主線，從中越、中老兩組邊界問題的共生特性出發，分析中國處理對老關係及中老劃界的政策緣起以及越南因素在其中的作用。

一 中共對越老「特殊關係」的先期接納

作為向弱勢民族主義革命黨提供援助支持、回應域外軍事威脅、確立自身革命路線法統的典型政策行為，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語境下「援老抗美」，即在越南內戰中援助支持北越政權的老撾黨與南越軍隊、美軍和國內親美勢力對抗，無疑彰顯出中共對於自身安全維繫、革命援助和輸出範式、黨際關係審度與地緣革命秩序的諸多邏輯理念。這一始於1960年代初、持續至1970年代中期的系統工程包含豐富的動因意涵，其波及維度之廣、實施力度之大、糾葛綿延之久，不僅與同期展開的「援越抗美」一道構成了中國的印支政策架構內最富實踐效力、最具政策張力、彼此觸撞交融的雙重要素，且為嗣後印支局勢的整體嬗變與中、越、老三方間的互動預留了因果註腳。「援老抗美」並非傳統視域下服務於「援越抗美」的次級行動，而是源於中國決策層獨立認知考量、基於特定地域方向的特定事件促動、貫徹自成體系的援外革命建構。

越老「特殊關係」的形成與印支三國的歷史密不可分。越老「特殊關係」涵蓋政治、經濟、安全、文化、軍事等多個領域，彼此將對方置於優先地位且高於其他雙邊關係。作為印支三國中實力最強大的國家，越南似乎認為幫助老撾已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迄1960年代初，在越老「特殊關係」下，越南領導人不僅要求老撾黨全面落實越南黨中央的各項政策，更是將越南經驗作為老撾建黨、建軍的第一指導，將「解放南方〔南越〕」與「保衛印度支那」並舉合一^④。與此同時，伴隨着法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正式承認印支三國獨立，法國即時從三國撤軍，老撾國內局勢雖然暫時趨於穩定，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卻在這一時期不斷深化。中共雖延續了先前確立的以越南為樞軸的援老革命「權宜」模式，但在其中加入了更多的外圍考量。日內瓦會議後，美國企圖將柬埔寨、老撾和南越納入「保護區」，並在老撾扶植親美勢力企圖推翻以富馬為首相的聯合政府，導致老撾爆發內戰。1960年8月，老撾中立派軍人貢勒（Kong Le）在首都萬象發動政變，親美軍人諾薩萬（Phoumi Nosavan）發兵攻擊，引起政局動盪；老撾黨和其他中立勢力結盟，多方爆發混戰^⑤。1961年6月，鑒於老撾各方勢力在國際周旋下業已停火，越南總理范文同向中方表示，準備逐步撤出越南志願部隊，增強老方領導力量，但中方卻一再鼓勵越方繼續維持在老撾的軍事存在。在隨後毛澤東與范文同的談話中，中方稱讚越方在老撾工作做得好，還肩負着幫助柬埔寨、泰國和馬來亞發展革命的任務^⑥。對此，越南領導人極其重視，表示今後在協助老東等兄弟黨的問題上，越南黨要先徵求中共的意見^⑦。

然而，中方的上述表態卻並非完全出於本意：中共仍將學習友國經驗視作老撾革命的必由之路，將本國在朝鮮戰爭與越南在抗法戰爭中「邊打邊談」

的鬥爭方略視作老撾革命的制勝法寶。事實上，中方此時已注意到越南不尊重老撾獨立性、「沙文主義很厲害」這一「嚴重情況」，之所以刻意彰顯越南黨的特殊地位，主要是出於在國際共運中進一步爭取越南的需要，同時也是為了鼓舞越南進行抗美戰爭的信心，突出其鬥爭成就^⑧。而越南在老撾問題上對中國的要求，除去國際共運鬥爭的聲援響應外，也希望中方能在援老物資方面承擔更多份額，減輕越方經濟壓力^⑨。

本着進一步籠絡越南黨，消解其芥蒂心理的考慮，中共的對老工作在「抗美援朝第一、團結第一、多做協調疏導」的籠統口號下更趨審慎。強化對老方的直接指導、未經越方許可向老方傳達政策意見，均被視作逾越中越兩黨黨際界限的非分舉動^⑩。不僅如此，中共對越老「特殊關係」的態度同樣受到自身反修路線的顯著影響，而聯合越老反修、將老撾問題作為批判「修正主義外交」例證的現實需要，又使中共竭力與越南黨求得至少是形式上的一致，為此不惜以承認越南在援老革命中的一線優先地位作為條件，以換取越老雙方在公開宣示中「接納」中國經驗，抵制蘇聯對老撾以至印支革命的影響^⑪。

1961年10月以降，受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影響，中國對蘇聯參與老撾問題國際談判的舉措愈加不滿，毛澤東此間除向越南領導人胡志明、黎筍再次表示越南黨在老撾的工作做得好，還直接首肯越南部隊參與老撾戰事，甚至建議越方「繼續裝作沒有派兵到老撾」，放心大打。爾後中方大力支持越南人民軍入老發起南塔戰役，以實現「第二個奠邊府」（越南黨和法國殖民當局於1954年爆發奠邊府戰役，以法軍戰敗告終），凸顯蘇方有關「單靠會議就能夠達成協議」的看法的荒謬性^⑫。在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大談國際階級鬥爭，強調無條件支持南越、老撾等國的武裝鬥爭。至中蘇論戰前夕，中方已在內部間接否定了起先限制越軍行動的表態，強調在老撾問題上與越南團結一致^⑬。當1963年6月黎筍等人明確贊同中共〈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並對蘇聯壓制老撾武裝鬥爭的做法表示不滿後，毛澤東當即要求越方加強對老撾黨的實際援助，表示「我們支援老撾的不過是一些武器，你們是犧牲生命。你們是在第一線的」，「我看不妨再來一個兩個三個南塔戰役」^⑭。

經過中方的反覆鼓動，越南黨更加堅定了大規模入老作戰的信心。在1963年9月廣東從化的中共、越南黨、老撾黨三黨會談上，越南黨對中共反修路線的聲援擁護更進一步，開始指責蘇方「阻撓老撾革命，態度囂張強硬」。鑒於越方態度愈加明朗，中共遂在1963年底同意越南黨增兵入老作戰，允許越軍精銳部隊過境雲南，前往支援老撾查爾平原地區作戰，中越兩黨在援老作戰與東南亞戰備方面的協同配合也進入高潮^⑮。繼1964年2月的越蘇兩黨會談不歡而散、越南在6月拒絕蘇聯提出的老撾和談建議後，周恩來等人復在7月的河內三黨會談期間再度談及反修問題，試圖借機使中、越、老三方對印支形勢和國際共運取得一致認識，進一步加強三黨團結。

不難看出，中方一面試圖與越南共同反對蘇共的「老子黨」作為，反覆強調「大黨小黨一律平等」與民族革命的自力更生原則，一面卻又默許越方對老撾革命的過度包辦。而當越方在實際工作中屢屢敷衍甚至違背中共倡導的老撾鬥爭「共同路線」時，中方客觀上亦很難與其據理力爭，只得盡量對兩黨分

歧採取遷就態度^⑮。不僅如此，隨着南越武裝鬥爭不斷擴大，越南在東南亞革命整體框架中的重心地位進一步強化。與東南亞其他地區（主要為印尼、馬來西亞、緬甸、泰國）革命相比，印支三國革命作為越南黨傳統責任範疇，本已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中共的認可。但在東南亞革命整體環環相扣的背景下，中共逐步越過印支革命分工的傳統「法理界限」，以「中央領袖」的心態直接干預老撾革命，由二線走向一線，亦是難以迴避的發展趨勢。

在中共看來，社會主義陣營給予老撾革命的首要支持並非物質援助，而是中國的革命經驗。對於老撾領導人學習中國統戰、民族治理、階級調查、作戰等方面經驗的任何傾向，中方內部均抱以相當程度的肯定與關切。中方不僅向老方反覆強調整黨、整軍、統戰等「同國民黨鬥爭的法寶」，還通過設立中央老撾工作組等高級統籌機構，主動參與處理老方建黨、建軍等「革命建設工作」^⑯。特別是在國內政治氛圍作用下，中國領導人認定「老撾革命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首先需要深入農村，運用階級分析法展開教育」，處理老撾中立問題也應「從不斷革命論出發」。中共對老撾黨發表意見，則愈來愈突出發動群眾進行「民主改革」、階級鬥爭等問題，從而不可避免地招致越方反感。越南顧問團即曾向中方明確提出：「老撾的情況是客觀革命環境造成的，階級問題還要研究，不能一下子甚麼都進行」，「老撾的主要敵人是美國及右派，如再劃分地主階級，又樹了一個敵人。兩個拳頭打人，不如一個拳頭打人」^⑰。

受地域環境與鬥爭對象的影響，1929年成立的印度支那共產黨（越南黨前身）在印支革命開展之初即將民族統戰與國際統戰混合為一，將「爭取印支各國的完全獨立」視作民族統戰基本立足點。印支革命的國際主義宣示也因此包含兩大基礎層面，即「越老柬三國各自的革命利益」與「三國共同的革命利益」。正是有了越方基於利益考量與革命熱情的大力介入，老撾本已陷入低谷的武裝鬥爭得以在1950年代末重新展開，這一突出貢獻遂成為越南黨論證其援老重要意義、「越老兩黨合作必要性」的有力依據。而隨着越南黨對自身鬥爭路線的信心日增，事實上它已不滿足於僅作為中共視域下東南亞革命「次級單元」的地位。至1960年代中期，越方一面在國內不斷強化對援老革命「國際義務」的宣傳力度，一面則在對外宣傳中大力鞏固其對老撾革命話語權的主導地位。此時，越南仍需中國給予印支三國巨大援助，但其提防中方、不希望中方影響其與老柬「特殊關係」的心態已十分顯著^⑱。

而在中國領導人看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核心要旨，除了平等和互不干涉內政，更重要的是各國共產黨的協調一致與相互援助。中共對國際分工與黨際關係獨立性的解釋表述，也基本服務於自身處理對外關係時的不同需要，具有較強的變通性^⑲。反觀越南黨，其在「國際主義教育」方面的突出特質即是民族主義情緒的一再凸顯。何況越南領導人眼中「最中心的問題」本就是越南問題，「包括老撾問題在內所有問題都得圍着它轉」^⑳。在此情況下，中越兩黨由於對國際主義概念的側重迥異，詮釋又屢經嬗變，故而很難在「發揚國際主義精神」的口號下，在援老革命上實現彼此方針的真正統合。因此，中方在對老工作中逐步強化的觀感認知是：中越對老撾問題的鬥爭方針基本一致，但隨着局勢發展，毛澤東思想與中國革命經驗必將在老撾產生深遠影

響；中方難以迴避的經驗傳輸與越方的細化干預注定抵牾，中越在老撾革命問題上已有「重大原則分歧」^②。

至於中老邊境地帶在這一時期的具體情狀，除有民間越境搶劫、盜竊，以及兩國邊民過耕、過獵等糾紛時有發生外，並未出現涉及邊界領土問題的顯著爭端，中老兩國政府也未就邊界走向的釐定與具體領土區塊的歸屬問題展開相關交涉^③。然而，表面的波瀾不驚並不意味着中老邊界全無問題隱患。中方在大力「援越抗美」並以越南為樞軸強化援老工作的歷史階段，主要利用滇西南地區毗鄰老方控制區及中立派武裝轄區的優勢條件，將中老邊界作為支援老撾黨政軍鬥爭的輔助孔道^④。加之中方於雲南地區的邊防布局以應對逃緬國民黨殘軍襲擾為主，關注焦點集中於滇西方向^⑤，故對中老邊界地段的詳細核查踏勘無從談起，老撾作為革命「友邦」的既設定位更是顯著衝抵了中方酌處邊界問題的政策欲望。而隨着老撾黨奪取國家政權的進程自1970年代初以降不斷加快，中老邊境也注定將面臨全新的政治氛圍、軍事場域與相應的管理模式。

二 中方對越南「印支聯邦」政策的敵性設定

(一) 中共與印支三黨關係的重新界定

1971年3月越南戰爭期間，越南人民軍與老撾黨建立的寮國戰鬥部隊一道取得了「南寮一九號公路」。在九號公路戰役的勝利鼓舞下，越南黨中央不僅決心以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畢其功於一役」，其對印支三國「協調一致、共同推進世界革命」的宣傳調門也日顯高亢。《人民報》、《人民軍報》自1972年初以降接連發表多篇社論，大談越南黨維護國際共運團結過程中的外交獨立性、抗美援朝與社會主義體系的相互援助，以及十月革命對越南革命的引導作用，同時反覆強調「在解放印支全境的抗美援朝事業中，民族獨立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並行不悖」，「應警惕尼克遜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欺騙、挑撥」^⑥。以上種種既流露出對中美自1971年「乒乓外交」後相互接觸的不滿，又可視作抬升越、老、柬「特殊關係」意涵的公開表述。

此時，以中共的視角觀察蘇聯建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以下簡稱「亞安體系」）的戰略，認為蘇聯這一「現代修正主義者」在東南亞着力最甚者，當屬「離間中越關係，破壞印支人民鬥爭，對我實施戰略包圍」^⑦。1972年4月，中央軍委、解放軍總參謀部特別指示昆明軍區：西南當下情況有了新變化，在蘇聯「策動挑撥下」，中國與印支及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可能緊張起來，甚至破裂」，對此「要十分注意、十分關切」，「昆明軍區不僅是繼續援越、援老抗美救國的前線，亦將成為抵抗蘇聯滲透的前線」^⑧。而隨着次年美國在《巴黎和平協約》（*Paris Peace Accords*）中允諾美軍撤出印支三國，越、老、柬分別先後與美國締結停戰協定，中方對「蘇修拉攏越南」的動機進一步解讀為「插手整個印支事務，孤立包圍我國」^⑨。換言之，根據中方的預判，蘇聯擴大對越援助、支持老撾成立聯合政府、承認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這一系列舉措，將使印支地區在未來愈加動盪，故務必要「保持印支陣地，抵制蘇修擴張」^⑩。

隨着作為越南抗美事業「次級單元」的老柬抗美鬥爭的戰事臨近尾聲，中國領導人開始愈發感受到於印支半島藉強力援東而「分朋引類」、固「本」破「圍」的緊迫性。彼時毛澤東對柬埔寨共產黨可望「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勝利」、「戰爭上完全靠自己」及決心「重建獨立的柬埔寨」深表欣慰，建議東方組建人數在十萬以上且包含軍、師級建制的正規野戰兵團，「形成拳頭，打到金邊」，並主張東共在建政後立即「打倒站在朗諾〔Lon Nol，1970年發動政變後掌權的柬埔寨總統〕一邊的地主」^③。進入1975年，隨着東共逐步縮緊對首都金邊的包圍圈並準備於5月前「一舉攻取之」，對比此時蘇聯通過各類外交機構頻繁接觸老撾中立派、「企圖擴大在老影響」等情狀^④，無論是東共「自力更生」的鬥爭表現，還是柬埔寨一國的革命前途，無疑都更加契合中共的審度標準，更堪稱「爭氣」。

至1975年6月，毛澤東對初得政權的東共大加讚賞，稱「你們很多經驗比我們好，中國沒有資格批評你們，只有贊成你們」^⑤。鄧小平更是直接肯定東共總的路線方針，表示理解甚至支持對波爾布特（Pol Pot）等東共領導人將金邊人口動員下鄉的做法。聯繫同期中方對越東邊境越軍活動情況的密切關注，中共已將援東革命列為長期「反美反修」的重要行動^⑥。中國領導人此時對東共的鼓勵態度及援助應允實際上已帶有一定程度的「防修（越南）」色彩，而以此心理為主導，中方對印支半島老泰等國事務的因應也愈發受到「越南樞軸」的強力左右。

10月17日，中國駐東使館武官處與柬埔寨人民武裝總司令部草簽了中國對東無償軍援意向協定^⑦。副總參謀長王尚榮於次年2月5日率軍事代表團秘密訪東，與東方商定了中國對東軍援的具體規模。根據協定，中方短期內向東共成立的民主柬埔寨（以下簡稱「民東」）新政權提供包括三個炮兵團、兩個坦克團在內的陸軍重裝備^⑧。同時，中方派出約500名軍事顧問赴東代訓各兵種軍官，並在1976年接收620名柬埔寨實習生來華學習海、空軍技術。不久，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又承諾給予東方「經濟技術援助」，具體援助項目包括新建海、空軍基地各一個，擴建磅遜港（今西哈努克港）及各主要兵工廠，等等^⑨。深受鼓舞的東共隨即對外宣稱：「要堅決與對柬埔寨內部事務的任何形式外來干涉作鬥爭，堅決反擊各種外來顛覆和侵略，不管是軍事的、政治的還是所謂人道主義形式下的。」^⑩而通過這種規模空前的物質援助與體系扶持，中方事實上已着手將柬埔寨打造為阻遏蘇越軍事布局的武裝堡壘，從而開啟了在軍事、外交、經濟等各方面全力支持民東政權的歷史進程^⑪。

1975年1月，老撾黨首度邀請蘇共代表團訪問桑怒解放區，其間蘇方發表種種對華影射言論，如「中國全力援助老撾，是由於老撾有許多東西使中國感到滿意」、「援助老撾的國家要思想純潔，不要一手給東西，一手藏利刃」，中共對凱山·豐威漢（Kaysone Phomvihane）等老撾黨領導人「視蘇修為社會主義陣營旗手」的容忍度勢必與日俱減^⑫。至7月間，已在老撾內戰中佔優、即將建立新政權的老撾黨因美泰經濟封鎖及國內反政府武裝而困難重重，蘇聯旋即加大對老援助力度，這一插足舉動在中方看來純屬「意在培植親蘇勢力，以滲透控制老撾」。特別是隨着老撾黨政機關內的留蘇幹部和蘇籍顧問大增，以及蘇聯壟斷老撾空運，中方認定蘇聯正「夥同越南，搞『蘇出錢、越出人』的

『共同援老』活動」^①。顯然，越南因素此時已成為中共眼中蘇聯勢力又下一城的主要推手。

1976年2月，越老兩黨在河內發表聯合公報，宣稱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鞏固越老「特殊關係」，在政治、軍事等各個領域進行全面合作。2至4月，凱山率老撾黨政代表團兩度訪蘇，蘇方表示將在1976至1980年提供3,200萬盧布無息貸款及5,900萬盧布軍事援助，老方遂投桃報李，在雙方的聯合公報中明確支持蘇聯包括「亞安體系」在內的各項對外政策，並在此後陸續獲得東歐各國的援助應允^②。1976年底，越南以「幫助老撾剿匪」為名，重新向老撾派駐志願部隊五萬餘人，控制了川壙、查爾平原、豐沙里、孟塞等戰略要地，並開始協助老軍「加強邊境防務」，客觀上與尚在老撾北部的中國築路部隊形成對峙局面。此外，以1977年2月蘇聯軍事代表團訪老為標誌，蘇方不僅開始向老撾派遣軍事顧問、供給老軍包括米格-21型戰鬥機在內的大量裝備，同時還着手在老撾各地修建雷達站、機場等軍事設施。此等舉動使蘇方短期內獲得又一「向東南亞擴張的跳板和反華據點」^③，從而進一步壓縮中方在印支地區的迂迴空間，迫使中方進一步加大對柬埔寨的戰略資源挹注。加之蘇越之間的頻繁呼應，因而強化了中共對越南黨的敵性判斷，促使中方加快針對越南的先期軍事準備工作。

自1977年4月起，昆明軍區根據總參謀部「跳出『對馬列主義國家不進行情報工作』教條」的指示，開始在南沙群島及雲南麻栗坡、文山、蒙自等地對越軍展開技術偵察工作，爾後又將情報偵搜範圍擴大至「越南的重要側翼」老撾（分別代號「絕密01、02任務」）；軍區後勤部此間亦奉總部命令，加緊建設服務「大規模野戰任務」的醫院、後方基地及軍用倉庫^④。5月14日，蘇聯《真理報》（*Pravda*）發表長篇評論，抨擊中方「為柬埔寨的世界性屠殺辯護」、「以擴張主義威脅東南亞國家」，而中方對於蘇越結盟的憂慮、特別是對越方一系列立場和作為的不滿，也在此前後達到臨界點，表現為在回絕越老經濟援助請求的同時，進一步凸顯對東共「自力更生、獨立自主、堅持反霸反修」的支持^⑤。

無獨有偶，在1977年9月波爾布特、英薩利（Ieng Sary）等東共領導人訪華期間，先是極言「要和中國同志生死與共，沒必要再找其他朋友」^⑥，爾後便借機向中方訴衷陳情，稱自1975年起爆發的多次越柬衝突並非一般意義上的邊境衝突，而是越南旨在征服柬埔寨的「民族歧視戰爭」^⑦。而在9月29日與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等人的談話中，波爾布特首先歷數越蘇在柬埔寨東部的「特務活動罪行」，強調越南正通過吞併老柬構建東南亞霸權，隨後稱當年7月簽訂的《越老友好合作條約》為「徹頭徹尾的殖民條約」，「越南通過老撾破壞泰國與東南亞革命，就像蘇聯通過古巴打安哥拉一樣，柬越間有些問題不是那麼好解決的」。華國鋒則明言，從戰略上講，蘇越已經合流，越南已成為蘇聯的爪牙，中越關係也愈來愈差，東南亞各國都應該對越南保持高度警惕。對於越柬邊界談判，鄧小平則作出承諾，中國今後對東南亞革命的支援會轉向從對方實際需要出發，但對柬埔寨革命則不限於此，中方可再向東方提供十萬人的武器裝備^⑧。

就在波爾布特等人與中方同聲共氣之際，越軍已根據「乾脆利索對柬進行懲罰」的方針，以師級規模兵力突入柬埔寨境內數十公里，並在此後不斷增兵

與民柬互攻對峙；越老兩國國防部此間還簽訂軍事協定，確定兩軍共同保衛印支半島，從而標誌着越老「特殊關係」進入以軍事聯盟為標誌的新階段。而隨着黎筭在當年底訪華時再度強調蘇聯對越援助意義、明確反對對美緩和，並對中方的「反霸反修」論調嗤之以鼻^④，中柬之間的相互呼應愈發明確。12月31日，民柬駐華大使畢姜(Pich Cheang)在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強烈抗議「越南在蘇聯支持下的大規模侵略行徑」。同一天，昆明軍區奉中央軍委命令接連召開兩次對越緊急戰備會議，通報了越柬衝突的最新發展，並首次提出「〔我們〕在邊境可能有所行動，要防止越在我邊境抓一把」^⑤。至此，中越關係也正式完成了由意識形態領域的盟友向敵人的轉化，進入到各自鞏固區內核心盟友、準備以軍事手段直接對抗的新階段。

(二) 中國醞釀對越老軍事「反擊」

繼1976年越南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建立「印支聯邦」由政治信念擢升為國家總戰略後，越軍的內部宣訓也開始強調「與印支半島各兄弟國家聯合作戰，捍衛社會主義祖國」，並將「人口眾多、經濟潛力大」的中國確立為主要作戰對象。以上想法迄1978年初已大體為中方所獲悉^⑥。華國鋒1月27日就對越經援問題談到：「越南過去打美帝，我們應該援助他，但他現在欺負柬埔寨，還揚言要打我們，我們怎麼能援助他呢？！」^⑦而在1977年下半年越柬戰事暫休、民柬仍面臨強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中方在密切注視中越邊境越軍動向的同時，除加緊對越老邊防鬥爭的情報收集及建制保障、為「一場尖銳的中越軍事衝突」作準備外^⑧，還特別將越方的攻東動機判定為「擴張主義野心使然」，稱越南欲通過推翻柬共現領導，組成以越南為盟主的「大印支聯邦」，並反覆強調蘇聯對越南侵柬的支持，認定蘇方意在通過「拉越壓柬」向印支半島和東南亞滲透擴張^⑨。

1978年3月，凱山·諾哈·馮沙萬(Nouhak Phoumsavanh)在老撾黨二屆五中全會上批評中國「調飛機、運大炮、派顧問到柬埔寨打越南」，稱中國在越柬衝突問題上「有意反越，犯了機會主義錯誤」。類似的公開表態與老撾對越南外交的跟進配合，加上蘇老兩軍年初達成的多項援助協議^⑩，使中方產生了老撾黨「靠蘇親越」、「在蘇修、越修驅使下加快反華步伐」的印象，但憑藉對越老兩黨微妙關係的長期洞察，尤其是與老撾黨領導人的諸多接觸，中共彼時並未將老撾黨與越南黨等量齊觀，而是在「老撾對越南擴張逆來順受」的基本判斷下，希冀老撾黨內部出現某種程度的分裂。特別考慮到老撾黨中央因自身「基層領導能力過度薄弱」而有求於越南，其內部對「特殊友誼」與「民族尊嚴」存在取捨糾結^⑪，因而中方仍視老撾黨為「就走甚麼道路、推行甚麼路線內部分歧激烈，矛盾日深」的執政黨，而非單純意義上「堅決統一反華」的「修黨」。

具體到對老撾黨思想動態與政治譜系的審度，中方迄1978年認定該黨內部已形成「親越派」與「民族派」兩大派別：前者包括總書記兼政府總理凱山、書記處書記兼副總理諾哈、外長奔·西巴色(Phoun Sipaseuth)、總參謀長西沙瓦·喬本潘(Sisavath Keobounphanh)等人，均係「掌握黨政軍大權，制訂、維護現行

政策」的實權人物；後者則以副總理富米·馮維希 (Phoumi Vongvichit)、國家主席蘇發努馮 (Souphanouvong)、國家計委主任馬·凱坎皮吞 (Ma Khaykhamphithoune) 為主，多屬「對敵鬥爭經驗較豐富，具有愛國思想，反對追隨蘇越，主張對華友好」的資深幹部。中方特別注意到，民族派不僅在越老「特殊關係」及對華態度問題上與親越派對立嚴重，其「以我為主」、對工商業逐步改造的經濟建設觀點，連同其對前老撾王國政府人員的懷柔統戰主張，也無不與親越派直接引入越式社會主義改造模式的激進路線相左。這些情況促使中方堅信老撾黨「對蘇修越修仍有戒心」，相當一部分老撾黨幹部只是迫於親越派壓力才「不得不說幾句反華的話」，「親越派在廣大幹群中不得人心，日趨孤立，兩派鬥爭將更加尖銳」^{⑤7}。

前述中方關於老撾黨政治分野與反越潛質的判斷，不僅奠定了嗣後相當一段時期離間越老「特殊關係」、分化越老同盟的政策基底，在中越敵對的蓄勢階段，更是強化了中國領導人眼中越南主導「印支聯邦」既無合法性、又無堅實基礎的印象，堅定了中方通過強力打擊越南從而加速「印支聯邦」消解的決心。鄧小平即在不久後談到，老撾存在一股相當大的反對越南、反對親越派的力量；對越鬥爭搞得越好，甚至可能引起老撾的變化^{⑤8}。

就在中方完成其本能的敵、友、中（中立）三派甄別，藉以達成對印支的革命支援向戰備壓制轉化之際，直到1978年上半年，蘇聯軍事存在之於中方的威懾效力有增無減，致使此間籠罩中共中央及軍方高層的緊張氛圍濃重如舊^{⑤9}。事實上，在鄧小平指示中央軍委戰略委員會加緊研究對蘇作戰方針的背景下，內陸各軍區雖遵照1975年7月軍委擴大會議精神，正逐步解除「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但中國以應對蘇聯入侵為基準的陸上邊防戒備卻在1975至1978年呈現不斷強化的趨勢，且尤以新疆、廣西、雲南為最^{⑥0}。而彼時在越方的對外釋述中，中越關係惡化的主因是中方要將「三個世界」劃分理論（1973年毛澤東提出將世界各國分為第一世界〔美蘇〕、第二世界〔已開發國家〕、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與反霸統一戰線構想強加於越南。越南黨中央認為，中國支援柬共意在反越，越柬戰爭的實質就是同「追隨毛主義的反動集團」的鬥爭^{⑥1}。

由是而降，伴隨着越南1978年6月底陸續攻佔柬埔寨磅湛、柴楨省多地，並在6月29日正式加入蘇聯牽頭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 (Comecon)，中共關於「越修暴戾恣睢」的既設描摹再添口實^{⑥2}。此後，在援越工程技術人員悉數調回後，總參謀部於7月末下達了〈關於嚴防越軍襲擊的指示〉^{⑥3}。同期，《人民日報》與民柬官方反越宣傳的互動呼應尤趨頻繁，外交部亦開始公開指斥越南武裝人員「侵犯邊界」，華國鋒、陳錫聯則在接待民柬副總理宋成時遽然發表了「柬埔寨人民面對外來的侵略和顛覆」、「我們一定支援你們的正義鬥爭」等直接言論^{⑥4}。對此，越南領導人黎德壽在8月曾忿言「沒有中國在背後支持，僅憑700萬柬埔寨人，波爾布特是不敢打我們的」，「中國建立了兩條軍事戰線，一條在西南邊界，一條在北方邊界（越北、越西北）」，並強調「注意老撾方面，老撾北部五省也受到中國很大壓力，要提防中國出動大軍襲擊」，「要同老撾同志一道鞏固邊疆」^{⑥5}。至此，越方高層已然投射出以北部邊境（包括中老邊境）抑遏中國、確保印支半島主體完整性的戰略理念。

三 中方對南線邊防的重新定位與中老邊界問題的解決

(一)「反修南線」戰略功用及運行機制的重塑

1973年3月，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全國陸地邊防會議，重點研究解決邊防部隊建設問題。昆明軍區隨後根據中共中央及軍委指示，漸次恢復了中越邊境河口、天保、小壩子及中老邊境壩灑、老卡、新寨等二十三個工作站的組織建制，並於1973年底復建了中老邊界沿線的思茅、西雙版納軍分區^⑥。自此以降，中老、中越邊境地帶以「反修防修」為動員主旨的邊防建設工作漸次展開^⑦。1975年7月，國務院、中央軍委下發關於中越、中老〈邊境地區邊防工作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指示對越方邊防人員的越界行為不予糾纏，此外對越老經滇南的借道要求亦盡量滿足^⑧。這種對越方侵犯中國主權行為的縱容，在客觀上加速了中老、中越邊境抵牾的惡性發展。而作為日後解決中老劃界問題的事實基礎，此間中方對中老邊界的勘探考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中方發現中老邊界二十四塊界碑中僅有九塊完好無損，其餘均有不同程度的損壞，但並未發現與1895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有嚴重出入的爭議地段^⑨。

自1969年中蘇珍寶島衝突直至1971年初美國再度擴大印支戰事，中方承受的兩線安全壓力尚可在越南「還有能力打」、且足以屏護「中國大後方」的情況下，通過「以印度支那經驗鞏固南線、以珍寶島經驗鞏固北線」來加以部分紓解^⑩。但隨着蘇聯於1975年啟動對越「全面援助」，又於翌年着手在越南多地修建軍事基地，造成「準備戰爭步伐加快、一北一南天天威脅」之勢^⑪，在鄧小平等人看來，南線邊防布局在面對越南軍事力量時所呈現出的單薄羸弱，無疑將在短期內成為攸關北線防禦成敗的戰略危患^⑫。由於認定蘇聯一手加緊對華戰備、一手「利用小修〔越南〕充當擴張工具」，兼之蒙古配合蘇聯遠東軍事活動的先例映射^⑬，蘇聯的「對華有限速決戰」必有「亞洲僕從」在側輔助，越蘇結盟的威懾性愈發緊迫：一面是越南藉由稱霸東南亞，與蘇聯遙相呼應；一面是蘇聯公開支持越南反華，對中國形成包圍態勢。中國軍方高層因而認為：「南北夾擊，說明戰爭是一定要打的」，「我們要準備兩面作戰」^⑭。而以軍方高層沿襲日久的「大戰備」心態進行研判，上述南方對華戰線鋪展就緒的時間節點，恰恰是以印支半島全面統於越南一尊為基準。

伴隨越蘇結盟進程的加快，1978年下半年中方已就越南對老柬兩國的整體政策動機形成核心判斷，即越南黨意在通過控制老柬，構建貫通印支三國的「印支大陸戰場」，實行以越老兩國北部為抗擊中國第一線的總體安全戰略，從而使北面向中國的東西戰略縱深增加一倍以上。此目標如若達成，總長逾2,000公里的中越、中老邊界將成為配合蘇聯戰略行為的最佳側翼^⑮。總參謀部在年底指出，蘇聯戰時為擺脫兩線作戰，必會「先把較弱的中國吃掉」，其手段除了利用中國高層和軍隊內部的混亂，就是要求越南實現南北配合，而先期準備工作即是通過條約控制越南，再通過越南聯結老柬，從南面向中國施壓。有鑒於此，中國必須強化以對抗蘇聯為中心的外交攻勢，同時對越南採取針鋒相對的軍事手段，不能因對越援助前功盡棄而洩氣^⑯。至此，中方以強力軍事措置彌補西南邊防疏漏的現實策略，在打破蘇聯全球布

局的宏大考量醞釀下付諸實施，最終在因應越南「印支聯邦」的戰略命題下不斷加速，演變為針對越老兩國協同一體、卻又有所區別的軍事行為。

(二) 對越作戰背景下的中老邊境

1978年11月初，黎筍、范文同率團訪蘇，雙方簽訂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此舉立時被中方視作「越南當局全面投靠蘇修的最終步驟」^{①⑦}。越南黨四屆五中全會隨即大談排華成果、強調已通過「決定性打擊華人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戰勝了北京擴張主義」，進而特別指出「中國反動派在西南和北部邊境對我造成嚴重破壞」，且越南在兩線作戰的同時還需援助老撾；為扭轉這一局面，應「迅速建立牢固的戰略部署」，首先堅決打贏「西南邊境戰爭」，爾後全力準備對華作戰^{①⑧}。而伴隨着1979年越南攻柬作戰的勝利，民東倒台，越南軍方業已預感到中國必將「作出瘋狂的反應」，但仍認定中國軍隊南下「成不了甚麼大氣候」，除去中共內部在對越問題上的分歧、解放軍戰力羸弱等原因外，更由於越南得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力支持，而中方則因「錯誤的政治路線」而處於孤立狀態^{①⑨}。黎筍甚至是毫不隱晦地談到，即便「中國軍隊在我國領土上作戰，數量不會很多，我們有越蘇條約」，強調「在當前形勢下，要一切為了打敗北京反動集團」，為此必須堅定地同蘇聯團結，且不應低估老東的力量，「設法保持越南、蘇聯、老撾和柬埔寨之間的戰鬥友誼」^{①⑩}。

而在越方將老撾緊密綁定至印支抗華戰線的同時，中方也根據戰略需求，擬制了同時進攻越北及老撾上寮地區的作戰計劃，後因實施難度過大，加之考慮集中打擊越南而放棄^{①⑪}。具體到上述不同戰備方案的籌備醞釀過程，不僅中老邊界業已查明的界劃含混處未引起中方注意，中央軍委在策劃針對中越邊境地帶的軍事行動時，在作戰地域的選擇上側重雙方衝突對峙劇烈的若干具體幅域，自始至終未將借助戰事一舉解決邊界劃分問題列為作戰目標。可以說，只要中方遲遲未將對越老的軍事舉措真正置於局部衝突的合理維度下，而是一味以「反霸反修」的全球視域統轄對越老的戰略思路，中越、中老邊界問題就不可能回歸適度、適時的政策框架。至此，原本理應作為國家核心利益考量、於衝突初期便應處理的邊界問題，經過中共反蘇戰略思維的投射映照，已然不復問題本身的基本技術屬性，而是一舉化為中方動員國內反越情緒的宣傳工具，以及因勢打擊越南對華軍事基礎的理想突破口。

1979年2至3月，中國發動懲越作戰，短時間內破壞了越北大量軍事基地和基礎設施。戰爭結束後，由於越軍迅速將駐老野戰兵團北調至上寮南塔、孟新等戰略要地，且老方亦出於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北部邊境的軍事部署，中老邊境地帶的軍事對峙形勢遂更趨緊張^{①⑫}。而基於越老「特殊關係」形成既久，且老撾黨對越南的全方位控制早有不滿，中方在1979年對越戰爭後即提出維持旨在分化越老同盟、利用老方不滿情緒加以統戰的對老工作方略^{①⑬}。同時，利用中老邊界疏隙較多、老方管理力有不逮的特點，扶助老撾境內部分反政府武裝力量，以此作為「留一手」的制約策略^{①⑭}。在邊境軍事鬥爭方面，中方針對越方總體實力有限、難以承受長期兩線作戰的特點，制訂了「以壓促變」的長期戰略，即通過主動奪取中越邊界騎線要

點，長期對越施加強大軍事壓力，最終迫使越方放棄侵東政策。而對老撾則主要通過主動派出作戰部隊控制中老邊境地帶出現糾紛的村寨，抵制老方領土訴求，以期使老方「知難而退」^⑤。

事實上，及至1984年中國對中越邊境的老山、者陰山發動拔點作戰（又稱「兩山輪戰」，1984-1993）前夕，中方對越老的政治攻勢已全面加強，「局面正在打開」，「我政治攻勢深入人心，邊民隔閡正在逐漸消除，越、老邊境地區一些黨政幹部態度也在發生變化」^⑥。而對於次年越南提出1990年從柬埔寨全部撤軍的動議，鄧小平的觀感顯然傾向越方「意在欺騙世界輿論，霸佔柬埔寨的野心不死」，加之認定越方對解決中越邊境問題毫無誠意、「妄想重新侵佔我國領土」，因而在鄧小平及軍方高層看來，有必要對越繼續作戰施壓，以「拖住越南人，迫其最終從東撤軍」^⑦。1985年11月，中央軍委指示雲南前線「在旱季作戰中對越保持更大的軍事壓力」，以此迫使越方兩線作戰，造成其政治、外交、經濟上更大的困難，並支援東泰兩國抗越鬥爭^⑧。此間越方雖承受巨大的安全壓力^⑨，但仍基於對中國不會發動大戰的核心預判，在中越邊境保持膠着對峙態勢的情況下，逐步縮減戰事規模，並在此期間繼續打擊柬埔寨境內抗越力量，最終將中越領土爭端的熱點轉向南海島嶼^⑩。

隨着中越陸地邊界的對抗烈度不斷降低，老撾作為越北戰線「重要側翼」的功能也不斷減弱，加之老撾國內面臨諸多經濟及安全領域困境，老撾黨中央遂開始向中方釋放緩和信號，主動與越南黨的既有宣傳保持距離^⑪。1985年12月2日，老撾黨和政府領導人在老撾建國十周年大會上，對中國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給予的支持和援助表示感謝，希望在1953年周恩來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基礎上，恢復與中國的正常關係^⑫。儘管中方此時仍認為越南尚未放棄建立「印支聯邦」的既定戰略，中共中央亦仍繼續要求貫徹「以壓促變」的方針，不同越南直接談判改善兩國關係，以求「敵變我變，以變制敵，保持主動，注重實效」，但軍方與外事部門均認為大幅改善中老關係的時機已到。1988年，中老兩國互派大使，邊民互市較之以往大幅增多^⑬。而由於中越、中老邊境地帶軍事防務的統一布置尚待解除，至1989年隨着凱山借訪華之機，為中越緩和及首腦會晤牽線搭橋，徹底解決中老邊界問題的時機業已成熟。

（三）中老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

由於毗鄰中國的老撾上寮地區在日內瓦會議後長期為老撾黨及中立派武裝控制，老撾王國政府實際自1950年代末便失去了與中國進行邊界磋商的能力，何況嗣後又因內外戰事而無暇他顧。此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老邊界一直保持軍事力量稀疏且漏洞極多的狀態。

1989年，駐老越軍撤出上寮地區。中老兩國政府於次年互派代表團，就中老邊界劃界遺留問題進行協商，就相關爭議地區進行談判。1990年9月23至27日，中國派出以外交部副部長齊懷遠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與以蘇里馮·達拉馮(Soulivong Daravong)為團長的老撾政府代表團在萬象舉行邊界談判，雙方確定以1895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及有關文件為基礎，參酌歷史延

續管轄情況，解決劃界問題。經過交換標有各自主張線的地圖，共發現七個地區存有爭議，涉及面積共104.35平方公里，其中屬中方超過中法條約線共五個地區計22平方公里，屬老方超過條約線共兩個地區計82.35平方公里——即是解決中老邊界問題的核心。中方於談判中提出了一攬子解決方案，即按《中法續議界務專條附章》規定，屬中方超過條約線管轄的五個地區調整歸屬老撾，老方則相應放棄超過條約線的領土要求。經過兩輪補充談判及實地考察，老方最終完全接受了中方方案，兩國政府代表團於1991年9月在北京順利草簽了邊界條約及其附圖；10月2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與老撾政府總理坎代·西潘敦(Khamtai Siphandone)正式簽署《中老邊界條約》，1992年1月21日正式生效^④。

1992年，中老邊界勘界、立碑工作陸續完成，其談判協調與最終落實速度之快，「在世界範圍內實屬罕見」^⑤。諾哈在《中老邊界條約》尚未正式簽署時即表示，中老之間是實實在在的友好關係，「中老邊界不存在問題，是條友好的邊界」^⑥。時至今日，中老邊境老方一側的安全管控任務，除有老撾邊防部隊擔負執行外，另有越南奠邊、山羅兩省邊防指揮部及部分下屬公安屯參與其中^⑦。越老「特殊關係」作為社會主義陣營超國家關係的最後遺產，至今仍深刻影響着老撾這一東南亞陸聯國的外交政策取向，但中老邊界自兩國締約起便再無明顯糾紛，中老劃界問題可謂因中國強力因應越南「印支聯邦」戰略而起，又隨越南在1989年宣布從柬埔寨撤軍後放棄「印支聯邦」歷史抱負而終。

四 結語

綜上可見，自1960至1980年代，無論是中共處理與老撾黨的黨際關係，抑或中國處理與老撾的邊界事務，其中均時刻貫穿着越南因素的強力左右。中國應對老撾問題與中老邊界的政策嬗變，即是因應越老「特殊關係」的反覆歷史。具體而言有三個方面：

第一，毛澤東在無形中將「天朝觀念」灌注入周邊外交的同時，也自然而然地接納了越南師法己身、亦屬根深蒂固的「小天朝」心態，這種革命視角下的「封疆遞降」雖不同於毛澤東本人十分排斥的蘇式管控，卻也帶有對鬥爭旗幟鮮明的「革命同道」予以褒獎的「恩賞」邏輯。結合同期與蘇分裂及爭取越南黨的需要，兼之越南頗具犧牲精神的鬥爭宣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無疑是希望「及時跟進」如越南黨等「本質尚好」者，能夠在國際革命派亟需資本的情況下擁有更大聲勢、具備更強實力、肩負更多責任，而一旦此般「革命主流至上，毋論其他」的思維模式形成慣性，中方便很難拒絕越方以「革命」的名義作出的壟斷舉動——此間屢見於中方駐老人員匯報的「越南同志過度熱情」，也隨中越關係嬗變，至1970年代後期以降被重新定義為「越南地區霸權主義與沙文主義行徑」。

從實際情況來看，無論是就分擔中共「亞洲革命」之責，抑或是盡己方「印支革命」之責的角色而論，越南黨中央均未如中方期許那般，履行播散中國革命經驗的「傳承薪火」使命，而是將老撾鬥爭置於更便操作、更契合己方革命道德基準的語境框架內。嗣後的歷史也進而說明，中共愈是將越老革命鬥爭按己

方意識形態需要「標籤化」，就愈易遭致越方或公開、或委婉的「逆標籤化」抵制，後者把握地域革命話語主導權的決心，恐怕早已超出「同志加兄弟」鼓譟下中方的理解乃至注意範疇。事實上，在中共社會動員與基層改造強度為越南黨深忌的情勢下，中方向老方的任何干預舉動，勿論其規模與初衷如何，都會引起越南黨的疑懼乃至惡感，從而與越南在此方向的終極安全需求漸生抵牾。

第二，縱觀越南黨 1970 年代以降的政策基準要義，除了國家統一的現實迫切需要，更重要者則是擺脫宗藩關係與殖民烙印陰影下的弱勢心態，從國防布局與黨國理念上重塑民族國家肌體，以一種相對正面的姿態，完成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渲染下的民族心理重建，從而進一步夯築越南黨在民眾面前獨立自主形象的正面意涵。聯繫中共黨內奉為圭臬的「武裝革命獨立論」，即「武裝鬥爭搞得多一些，取得的勝利會鞏固一點，獨立性就強一點」^①，越南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向社會主義前進」口號下凸顯出的「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也絕非全然是自我膨脹的標榜之辭^②。

越南黨的正統革命宣教中，其針對東南亞革命「莫斯科—河內」二元中心的語境設置，在詮釋域內外黨際關係時帶來了顯著優勢：一方面，黨可以利用早期共產國際分工架構下的法統遺產，衝抵因學習中國經驗而造成的若干「自卑」心理；另一方面，亦可憑藉處於印支抗殖武裝革命一線的資本，掌握對老柬等國兄弟黨的指導特權。越南黨高層對「越南道路」與越南黨鬥爭能力的自信，以及在此基礎上將符合民族利益的本位考量付諸實踐的決心，無形中增加了越南黨力爭「先進」、踐行馬列主義要旨（典型如國際主義）的意識形態衝動。

第三，由於中共長期未將老撾黨與老撾視作真正獨立的行為實體，中國的對老政策，特別是針對中老邊界的管控處理，實際上長期未能游離對越政策的直接或間接衝擊，遑論及時制訂切實反映對象國心理需求與現實考量的戰略框架。自此角度言之，中國自 1970 年代中期以降的對越政策經歷了由全球反蘇宏大戰略組成部分，向局部衝突具體因應的回歸，同期的對老政策也經過區別對待越老兩國的策略延宕，最終走上了真正「分門別類」的科學路徑。以上既可視作社會主義陣營黨際關係之於國家關係的不對稱效應，又凸顯出中國領導人對於周邊域內強勢集團「分朋引類」、保障自身安全輻射空間的思維慣性。中老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作為中老關係「遲到的副產品」，其問題本身的突兀建構與自然解決，不啻為當下中國靈活因應與周邊國家的領土或群體性領海爭端提供了有益借鑒。

註釋

①^① 雲南省公安邊防總隊編：《中國公安邊防·雲南卷》，上冊（內部發行，1998），頁 247-50；253。

② 成都軍區司令部編：《軍事鬥爭準備工作（戰備工作研究）》（內部發行，2008），頁 37、39、41-42。

③ 分別參見 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Mari Oslen, *Soviet-Vietnam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1949-64: Changing Alli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6); Cheng Guan Ang, *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a Conflict, 1956-1962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 Geoffrey C. Gunn, *Political Struggles in Laos, 1930-1954: Vietnamese Communist Power and the Lao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Bangkok: Editions Duang Kamol, 1988); Christopher E. Goscha, "Vietnam and the World Outside: The Case of Vietnamese Communist Advisers in Laos (1948-62)",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12, no. 2 (2004): 141-85; Lien-Hang T. Nguyen, *Hanoi's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War for Peace in Vietnam*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需要說明的是，越南國內雖出版有大量關於越老「特殊情誼」的官方著述，但此類著作大多圍繞既定宣傳口徑，論說頗程式化，難以將其歸入嚴肅的史學研究範疇。相比之下，以原始檔案文獻為基礎的系統研究則少之又少，較典型者如黎廷政：《越老全面合作特殊關係，1954-2000》（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07）。

④ 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越老特殊關係歷史事件編年（1930-2007）》，上冊（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11），頁531；〈胡志明主席致老撾愛國戰線中央委員會主席蘇發努馮親王關於祝賀老撾愛國戰線政治綱領公布的電文〉，載胡志明：《胡志明全集》，第十二卷（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11），頁419；王道征：〈越南和老撾的「特殊關係」是怎樣建立的？〉（2020年7月2日），《東南亞觀察》，第37期，www.essra.org.cn/view-1000-817.aspx。

⑤ Timothy N. Castle, *At War in the Shadow of Vietnam: U.S. Military Aid to the Royal Lao Government, 1955-197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25, 27.

⑥ 中國外交部：〈毛主席接見范文同總理談話紀要〉（1961年6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以下簡稱「外檔」），204-01445-04，頁41-47；〈關於在老撾設立代表機構的報告〉（1961年6月12日），外檔，106-01366-02，頁31。

⑦ 羅貴波：〈致周恩來的報告〉（1961年6月22日），外檔，204-01445-04，頁49；何偉：〈致外交部、中聯部並中央電〉（1961年7月13日），外檔，204-01445-04，頁58。

⑧ 中國外交部：〈陳毅副總理接見老撾代表團談話記錄〉（1961年2月10日），外檔，106-00951-03，頁30；中國駐越使館：〈老撾當前軍事鬥爭中的一些情況〉（1961年3月23日），外檔，106-00960-01，頁5；中國外交部：〈關於接待范文同總理率領的越南政府代表團來訪的請示報告〉（1961年5月27日），外檔，204-01444-07，頁2；〈劉少奇主席接見以范文同總理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團的談話紀要〉（1961年6月12日），外檔，204-01445-03，頁40-41；〈張宗遜副總長、甘泗淇副主任向老撾愛國戰線黨主席蘇發努馮介紹我軍經驗〉（1961年7月4日），外檔，106-00612-02，頁37；中國駐越使館：〈范文同總理六國之行〉（1961年9月15日），外檔，106-00942-03，頁4。

⑨ 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關於1959年8月4日討論援老革命經費與幹部問題的會議〉（1959年8月29日），載越南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編：《越老特殊關係歷史文件集（1930-2007）》，第三冊（河內：國家政治出版社，2011），頁37；中央供給委員會：〈致政府總理報告〉（1961年6月2日），越南第三國家檔案館總理府數據庫，7809；中國外交部：〈周恩來總理和范文同總理第三次談話紀要〉（1961年6月15日），外檔，204-01445-01，頁29-36。

⑩ 中國駐老撾工作組：〈第一次會議紀要〉（1964年8月31日），外檔，106-00902-01，頁1-2；中國外交部：〈陳毅同志同諾哈同志關於國際形勢問題的談話記錄〉（1962年9月10日），外檔，106-01386-02，頁76-78。

⑪ 中國駐越使館：〈寮方準備在四黨會議上作的「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1962年12月20日），外檔，106-01426-04，頁26；中國駐老使館：〈關於老對外關係問題〉（1963年2月21日），外檔，204-00923-02，頁18；中國外交部：〈鄧小平代總理接見蘇發努馮夫人談話記錄〉（1964年2月5日），外檔，106-01459-01，頁13。

⑫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9-40；〈毛澤東與胡志明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61年

- 11月14日)：中國外交部：〈陳毅副總理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1年2月8日)，外檔，109-03754-03，頁75-76；〈陳毅關於日內瓦會議最後階段給總理並中央的報告〉(1962年8月)，外檔，106-00743-01，頁142。
- ⑬ 中國外交部：〈周總理、陳毅副總理與范文同總理談話記錄〉(1962年8月27日)，外檔，106-01386-01，頁129；中國外交部：〈在老撾問題上蘇聯可能提出來攻擊我們的謬論〉(1963年5月)，外檔，106-00743-01，頁80-81。
- ⑭ 〈毛主席接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63年6月4日)。
- ⑮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163-64；〈毛澤東接見越南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3年6月4日)(內部材料，出版時間不詳)；中國駐越使館：〈黃文歡和凱山同志同朱其文同志談話要點〉(1963年6月20日)，外檔，106-01117-02，頁42-43；《楊成武年譜》編寫組編：《楊成武年譜(1914年-2004年)》(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頁387、392、403。
- ⑯ 中國駐老代表團：〈一九六三年軍事友好工作總結〉(1963年12月14日)，外檔，106-00818-02，頁30-31；中國外交部：〈周恩來總理同蘇發努馮、馮維希第二次談話記錄〉(1964年10月10日)，外檔，204-01534-04，頁21-27。
- ⑰ 中國駐越使館：〈老撾政變四個月來的形勢〉(1961年1月24日)，外檔，106-00964-02，頁10；中國外交部：〈蘇發努馮經北京過境訪問的情況簡報〉(1961年7月7日)，外檔，106-00612-03，頁53；中聯部：〈外賓情況簡報：凱山同志情況反映〉(1961年8月3日)，外檔，106-01372-01，頁23；中國外交部：〈周恩來總理接見老撾蘇發努馮親王談話記錄〉(1962年9月23日)，外檔，106-01386-09，頁39；〈關於籌建我駐老撾桑怒機構的請示報告〉(1963年10月21日)，外檔，106-00751-03，頁21。
- ⑱ 李杰：〈段蘇權出使老撾記〉，《百年潮》，2000年第7期，頁23-24；中國外交部：〈章漢夫同志介紹日內瓦會議情況〉(1962年1月6日)，外檔，102-00100-01，頁11；段蘇權：〈致楊成武並老撾工作組電〉(1964年11月20日)，外檔，106-00895-01，頁2；中國駐桑怒工作組：〈越南顧問團團長阮仲永同志談戰略方針〉(1965年1月5日)，外檔，106-00896-01，頁6。
- ⑲ 越南勞動黨中央書記處：〈加強老撾革命的宣傳聲援工作〉(1965年12月22日)，載《越老特殊關係歷史文件集(1930-2007)》，第三冊，頁109-10。
- ⑳ 蘇聯駐華使館：〈尤金關於南斯拉夫問題與毛澤東的會談備忘錄〉(1958年4月5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0100，оп.51，п.432，д.6，л.122-34；蘇聯駐華使館：〈關於中蘇兩黨會談前國內情況的報告〉(1963年5月17日)，АВПРФ，ф.5，оп.30，п.101，д.424，л.91-141。
- ㉑ 蘇聯駐越大使館：〈關於越南民主共和國國內政局尖銳化的情況〉(1957年1月5日)，АВПРФ，ф.5，оп.28，п.122，д.485，л.1-16；托夫馬相：〈1960年莫斯科會議後越南勞動黨的動向〉(1961年10月17日)，АВПРФ，ф.079，оп.16，п.31，д.3，л.35-57。
- ㉒ 中聯部：〈凱山同志介紹老撾情況第五次談話記錄〉(1963年9月24日)，外檔，106-01425-01，頁108-109；中聯部、外交部、總參：〈致駐桑怒工作組電：關於和寮、越方關係問題的補充通知〉(1965年5月17日)，外檔，106-00902-02，頁50。
- ㉓ 雲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雲南省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1)，頁208。
- ㉔ 關於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國援老的基本情狀，參見馮一鳴：〈「革命」與「中立」之間：中國對老撾初期政策探析——以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籌備階段為核心的考察〉，《冷戰國際史研究》，第21輯(2016年11月)，頁127-28。
- ㉕ 雲南省省區：〈弘揚傳統 戍邊衛國——深切緬懷查玉昇將軍〉，載馬子龍、呂登明主編：《查玉昇紀念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3)，頁18-20。
- ㉖ 〈越軍報刊登越人民軍總政治局主任雙豪的文章〉，《國際共運參考資料》(內部發行)，第4659期(1972年2月2日)，頁3；〈越人民報社論「百戰百勝的民族」〉，《國際共運參考資料》，第4689期(1972年3月3日)，頁2；〈越普通時報雜誌文章「回顧一年的外交勝利」〉，《國際共運參考資料》，第4778期(1972年5月31日)，頁6。

- ⑳ 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蘇軍資料彙編》（內部發行，1974年4月），頁54-55；新華社國際資料組編：《東南亞五國》（內部發行，1974年10月），頁50；公安部一局編：《蘇聯特務間諜概況》（內部發行，1982年6月），頁87-88。
- ㉑㉒ 成都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昆明軍區情報工作史（1955-1985）》（內部發行，1998年10月），頁83、105-106；138、289、310。
- ㉓ 新華社國際部資料組編：《蘇修策劃「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第二冊（內部發行，1974年4月），頁1-2。
- ㉔ 廣州軍區司令部情報部：《一九七三年印支情況綜合》（內部發行，1974年1月）。
- ㉕ 〈毛澤東與喬森潘、英薩利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74年4月2日）。
- ㉖ 總參謀部情報部編：《老撾軍情》，第4期（內部發行，1973年3月）；廣州軍區司令部情報部：《老撾臨時民族聯合政府和民族政治聯合委員會的成立及其發展趨向》（內部發行，1974年4月）。
- ㉗ 〈毛主席會見柬共中央書記布特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75年6月21日）。
- ㉘ 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越南概況》（內部發行，1980年6月），頁271；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內部發行，2004年4月），頁91、167。
- ㉙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致民主柬埔寨革命軍總參謀部函〉（1977年10月5日），柬埔寨國家檔案館，B. 6-2-5-23。
- ㉚ 〈中國對柬埔寨無償軍事援助統計（1976-1978）〉（1979年8月），柬埔寨國家檔案館，B. 1-25-25。
- ㉛ 〈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王尚榮與宋先談話記要〉（1976年2月6日），柬埔寨國家檔案館，B. 8-2-5-05；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編：《國際共運大事記（1976年1月至12月）》（內部發行，1977年11月），頁47-48。
- ㉜ 新華社國際部資料組編：《越南侵柬大事記（1975年6月—1978年12月22日）》（內部發行，1978年12月），頁4。
- ㉝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92。
- ㉞㉟ 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老撾概況》（內部發行，1980年12月），頁121；97、188-89。
- ㊱ 廣州軍區司令部情報部：《一九七五年老撾情況綜合》（內部發行，1975年12月）。
- ㊲ 《國際共運大事記（1976年1月至12月）》，頁27、36、40-41。
- ㊳ 《老撾概況》，頁120-21。抗美戰爭期間活動於老撾戰場的越南志願軍已於1975年10月基本撤回國內。參見越南人民軍總後勤局編：《越南對老撾革命支援總結》（內部發行，出版時間不詳）。
- ㊴ 《昆明軍區情報工作史（1955-1985）》，頁94、167；雲南省軍區編：《雲南省軍區軍事工作大事記》（內部發行，1990年7月），頁403-405。
- ㊵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蘇聯研究所編：《蘇聯情況》，第117期（內部發行，1977年6月13日）；石林：〈關於當前國際形勢問題〉（1977年7月13日），甘肅省檔案館，1511/002/0077，頁36-39；《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編著：《李先念年譜》，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頁483、488、491、510。
- ㊶ 中國外交部：〈接待柬埔寨黨政代表團簡報（第一期）〉（1977年9月28日），河北省檔案館，1057/3/2，頁56。
- ㊷ 〈胡啟立、喬石同志和日本社會黨代表團第三次會談記錄〉（1983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中央聯絡部文件》聯文（83）198號。
- ㊸ 〈華國鋒、鄧小平與波爾布特、英薩利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77年9月29日）。
- ㊹ 法國駐華使館：〈致法國外交部電〉（1978年7月12日），法國外交部檔案館，14INVA/391，no 1530/36。轉引自李雲逸：〈1975-1979年中越關係的流變——基於法國外交檔案的考察〉，《冷戰國際史研究》，第26輯（2018年11月），頁100。
- ㊺ 《越南侵柬大事記（1975年6月—1978年12月22日）》，頁6；《昆明軍區情報工作史（1955-1985）》，頁167-68。

- ⑤① 成都軍區司令部：《越軍對華作戰的軍事戰略》（內部發行，1985年3月）；昆明軍區司令部軍訓部編：《越南戰役學》（內部發行，1981年1月），頁19、23；牛亞平主編：《越南軍事戰略研究》（內部發行，1992），頁71-72。
- ⑤② 對外經濟聯絡部：〈中央領導同志關於經援工作的一些重要指示〉（1978年），甘肅省檔案館，151/002/0100，頁2。
- ⑤③ 中國外交部：〈對越東武裝衝突的初步看法〉（1978年1月27日），四川省檔案館，建川1/9/366，頁39-42。
- ⑤④ 《老撾概況》，頁122-23；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老撾軍政概況》（內部發行，1979年1月）；《越南侵柬大事記（1975年6月—1978年12月22日）》，頁10-11。
- ⑤⑤ 《老撾概況》，頁109-11、198-206；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老撾重要軍政人物》（內部發行，1978）；《老撾軍政概況》。「親越派」與「民族派」根據各自骨幹成員籍貫，又稱「下寮派」與「上寮派」。
- ⑤⑥ 鄧小平：〈在京黨、政、軍副部長以上幹部大會上的報告〉（1979年2月26日），甘肅省檔案館，91/012/0217，頁27。
- ⑤⑦ 鄭文翰：〈粟裕與軍事科學研究〉，《軍事歷史》，2003年第2期，頁57。
- ⑤⑧ 總參謀部動員部、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部編：《人民武裝動員史》，第二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頁571-72；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77年12月2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軍事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75。
- ⑤⑨ 越南駐華大使：〈談中越關係〉（1978年6月2日），法國外交部檔案館，14INVA/382，no 1792/96。轉引自李雲逸：〈1975-1979年中越關係的流變〉，頁101。
- ⑤⑩⑪ 《越南概況》，頁435；183。
- ⑤⑫ 昆明軍區司令部編：《昆明軍區軍事工作大事記（1949年2月—1985年6月）》（內部發行，1985年7月），頁202。
- ⑤⑬ 《越南侵柬大事記（1975年6月—1978年12月22日）》，頁17-19；《人民日報》社編：《中越邊境衝突的真相》（內部發行，1979年6月），頁13。
- ⑤⑭ 〈黎德壽在接見北方退休的少數民族幹部時的講話〉（1978年8月6日），載總參謀部情報部編：《自衛還擊作戰繳獲文件選編》（內部發行），第7號（1979年3月29日），頁9、18。
- ⑤⑮⑯ 《雲南省軍區軍事工作大事記》，頁386、388-89；497-98、534。
- ⑤⑰⑱ 總政治部聯絡部編：《昆明軍區聯絡工作史》（內部發行，出版時間不詳），頁445、456；542。
- ⑤⑲ 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中越邊境地區邊防工作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內部發行，1975年7月20日）；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中老邊境地區邊防工作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內部發行，1975年7月20日）。
- ⑤⑳ 昆明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雲南邊防工作手冊》（內部發行，1977年1月），頁45-46。
- ㉑ 〈毛澤東接見越勞第一書記黎筭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70年5月11日）；〈周恩來接見全國援外工作會議、旅遊會議全體代表時的講話〉（內部材料，1971年4月7日）。
- ㉒ 《越南概況》，頁183；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辦公廳：《中聯部老部領導談黨的對外工作》，頁168。
- ㉓ 成都軍區司令部編：《「兩山」作戰經驗彙編·後勤保障分冊》，下冊（內部發行，1988年12月），頁364。
- ㉔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編：《蘇軍基本情況及作戰指導思想》（內部發行，1978年3月），頁17-18；〈烏蘭夫同志在全國邊防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內部材料，1979年4月25日）。
- ㉕ 〈軍區副司令員、交通戰備領導小組組長向守志同志在軍區交通戰備會議結束時的講話〉（內部材料，1978年6月23日）。
- ㉖ 《越南軍事戰略研究》，頁175、204-205；石家莊高級陸軍學校訓練部編：《廣西、雲南與越南、老撾北部地區軍事地理》（內部發行，1982年7月），頁15-20。
- ㉗ 總參謀部：《妄圖稱霸世界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內部發行，出版時間不詳）。

- ⑳ 越共中央：〈第五次會議決議〉（1978年12月），載《自衛還擊作戰繳獲文件選編》，第1號（1979年3月28日），頁4。
- ㉑ 越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1979年1月18日），載《自衛還擊作戰繳獲文件選編》，第2號（1979年3月28日），頁16-17。
- ㉒ 黎筍：〈對軍隊在新階段中黨和政治工作的指示〉（1979年1月19日），載《自衛還擊作戰繳獲文件選編》，第2號，頁21。
- ㉓ 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老撾軍政概況》；《昆明軍區軍事工作大事記（1949年2月—1985年6月）》，頁207；昆明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老撾西北部兵要地志》（內部發行，1979年12月），頁99-100。
- ㉔ 成都軍區司令部情報部：〈我自衛還擊戰後越軍變化及老軍情況〉（內部材料，1979年4月）。
- ㉕ 考慮到老撾境內的反政府武裝力量在1976年即達兩萬之眾，嗣後雖經老撾人民軍及駐老越軍多番清剿，至1978年上半年仍有相當實力，且與境外各反共政治組織互動頻繁；加之克格勃（KGB，國家安全委員會）及東德情報人員以經濟、軍事顧問等身份滲透老柬兩國，並在老撾查爾平原及柬埔寨馬德望建立大型對華電子偵聽站，1980年6月，昆明軍區軍訓部根據中聯部、總參外事局指示，在思茅、小猛養訓練老撾反政府武裝學員430人。1981年2月，昆明軍區召開支援越老反抗武裝問題聯席會議，嗣後至1982年6月，計有老撾武裝人員兩批共350人來華受訓。參見〈老撾國內反政府武裝力量情況〉，載《自衛還擊作戰繳獲文件選編》，第5號（1979年3月28日），頁55-57；《蘇聯特務間諜概況》，頁89-90；昆明軍區司令部軍訓部編：《昆明軍區司令部軍訓部大事記》（內部發行，2000年5月），頁356-59。
- ㉖ 〈總政治部關於聯絡工作情況和今後任務的意見〉（內部材料，1984年3月22日）。
- ㉗ 成都軍區雲南前指政治部：〈堅決貫徹中央、軍委作戰方針，為保衛偉大祖國而英勇作戰〉（內部材料，1985年10月）。
- ㉘ 濟南軍區編：《鏖戰南疆——老山地區防禦作戰戰例、總結》（內部發行，1986年），頁173、200。
- ㉙ 越方十分擔心在未來的中越戰爭中，中方會在越南國土蜂腰部登陸，扼其咽喉，南北夾攻，使河內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參見海軍司令部情報部編：《越南海軍基本情況》（內部發行，1988年7月），頁71-73。
- ㉚ 成都軍區司令部編：《「兩山」作戰經驗彙編·越軍研究》（內部發行，1988年12月），頁26-29。
- ㉛ 總參謀部情報部：〈凱山在老黨中央和部長會議聯席會議上的講話（節錄）〉（內部材料，1986年11月）。
- ㉜ 雲南省軍事志編纂委員會編：《雲南省軍事志（1985-2005）》（內部發行，2011年8月），頁190。
- ㉝ 廣西軍區司令部偵查處：〈中越邊境廣西段軍事鬥爭現狀及發展趨勢〉（1987年12月），載總參謀部情報部：《印支形勢座談會材料選編》（內部發行，1987年12月），頁48-49。
- ㉞ 《雲南省軍事志（1985-2005）》，頁190-91；《中國公安邊防·雲南卷》，上冊，頁251-53。
- ㉟ 〈老撾最高人民議會代表團訪問昆明〉，《雲南外事》，1991年第1期，頁20。
- ㊱ 成都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越南軍情》（內部發行，2012年8月），頁229。實際上，自1990年代至今，老撾人民軍中層指揮人員的培訓、部分技術兵種的籌建，乃至戰備偵察工作的開展，均仰賴越南軍方給予援助甚至代為完成。參見廣州軍區司令部情報部編譯：《越南特工部隊》（內部發行，出版時間不詳），頁115。
- ㊲ 〈周恩來與金日成談話記錄〉（內部材料，1972年8月24日）。
- ㊳ 文造著，關天晞譯：〈越南革命與中國革命之不同〉，《印度支那研究》，1981年第2期，頁36。